

本书获浙江行政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形构	(员)
摇摇一 启蒙与专制	(圆)
摇摇二 救亡与翻身	(苑)
摇摇三 英雄与民粹	(员缘)

上编 摇主义与文学

第一章 摇启蒙主义的西来与中国化	(圆)
摇摇第一节 摇“前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碰撞中的 摇摇 启蒙选择	(圆)
摇摇第二节 摇“五四”时期：启蒙的理性认同与 摇摇 现实展开	(猿)
摇摇第三节 摇新时期：启蒙与新启蒙的双重并置	(源)

第二章摇专制主义与民主意绪	(源
摇第一节摇梁启超的“开明专制”与蒋廷黻	
等人的“独裁论”	(源
摇第二节摇“五四”文学的唯意志论倾向	(缘
摇第三节摇“战国策派”错开的救国药方	(远
摇第四节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远
第三章摇民粹主义与工农兵文学	(苑
摇第一节摇民粹主义：一个与启蒙主义相对立	
的话题	(苑
摇第二节摇劳工神圣：到农村去、到工厂去、	
到民间去	(愿
摇第三节摇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祈愿：从信念到精神	(愿
摇第四节摇启蒙角色转换与主流话语生产	(愿
第四章摇英雄主义的范式演进与精神向度	(员
摇第一节摇现代化诉求的急迫和英雄品格的营构	(员
摇第二节摇英雄范式的演进与转换	(员
摇第三节摇告别英雄：小人物的出场与狂欢	(员

下编摇文化与文学

第五章摇圆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	(员
摇第一节摇危机背景下的文化心态和中西之争	(员

摇第二节摇“五四”前后文化论争的三个关键词	(页码)
摇第三节摇从西方化到本土化再到第三条道路	(页码)
摇第四节摇既定性还是创造性：文化转型的另一 形态	(页码)
第六章摇新时期诗歌的思想生成与先锋走向	(页码)
摇第一节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地下诗歌写作	(页码)
摇第二节摇思想生成：朦胧诗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页码)
摇第三节摇先锋走向：实验诗与诗歌中的行为主义	(页码)
摇第四节摇知识分子、纯诗与叙事性	(页码)
第七章摇新时期历史小说的现代性及其走向	(页码)
摇第一节摇历史小说：政治激情与人格信仰的投射	(页码)
摇第二节摇新历史小说：现实迷惘与精神无奈的 感喟	(页码)
摇第三节摇作家的主体认知与审美心态	(页码)
摇第四节摇文的解放及其现代性历程	(页码)
摇第五节摇历史叙事中的审美与审丑	(页码)
摇第六节摇史诗文体的建构与消解	(页码)
摇第七节摇革命历史小说的文体策略及阐释程式	(页码)
第八章摇寻根文学的精神谱系与文化属性	(页码)
摇第一节摇寻根文学的命名与知青作家群体	(页码)
摇第二节摇寻根文学的精神主旨与审美属性	(页码)

摇第三节摇寻根文学的现代视野与启蒙悖论	(圆)
摇第四节摇未完成的民族形式话语	(圆)
摇第五节摇文化保守主义与山野精神	(圆)
附录一摇年代的诗学命题	(圆)
附录二摇年代文学的生存状态	(圆)
主要参考书目	(圆)
后摇记	(圆)

导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形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启蒙与救亡、自由与专制、个体与群体、中学与西学、娱情与经世……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启蒙、救亡、翻身、专制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核心话题。启蒙为的是国人脱离“吃人”和“被人吃”的“不成熟状态”，成为一个“敢于认识”自己的人^①。专制承袭的是封建主义礼法，力图维持“吃人”现状。救亡为的是民族国家建立，摆脱“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②。相对于启蒙的“立人”主题与救亡的“立国”主题的普适性而言，翻身则主要落在工农兵身上，实现农民阶级“耕者有其田”和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理想。不同主题之间虽然各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运行轨迹，但也有相互生成与建构的一面。不幸的是，晚清以来的现代性焦虑常常使之处于相互缠绕与矛盾的状态，一个时期，“启蒙”占据主导地位；一个阶段，“救亡”重于一切；一段时间，“翻身”深入人心。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救

① [法]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7页。

亡、翻身、专制主题并存的经验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它们之间互有隐显的结构形式决定了圆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与面貌。

一 摇启蒙与专制

启蒙主题高举科学、民主大旗，以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为思想资源，以中国人非人的生存状态为前提，把人的觉醒与解放作为目标。在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启蒙先驱那里，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公民权利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再通过其他东西而获得合法性，而是恰恰相反，无论政治制度、道德规范，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需要通过人的自由和权利保障而获得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是无须证明的，而是需要通过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而获得。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①。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还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胡适倡导“易卜生主义”，并以文艺复兴运动的姿态告诫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② 鲁迅更是发出“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

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1915 年 1 月。

②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1 号，1918 年 1 月。

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的呼声^①。从“五四”一代人有关启蒙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范畴：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而区分这一切的尺度正是“五四”文学的“人学”标准。

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人”的关注、“人”在文学中地位的重新确立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伤痕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意义，首先便在于恢复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写人的命运也好，写人的伤痛也好，其实都是在倡导人的觉醒。其次，伤痕文学恢复了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手执批判的武器，横扫长期的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风，将文学从个人迷信和造神运动的牢笼中解放出来”^②。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学启蒙也有它的局限和遗憾。当它呼唤人们从专制主义文化中走出的时候，并未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人文启蒙所应关注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这一基本命题。它只是将人从专制愚昧中解放出来，忘记了给人指明未来的生活之路，特别是如何处理金钱与人生、人的当下关怀与终极眷顾等关系问题。

80年代后期，随着大众文化、声像文化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启蒙精神开始走向式微。自由、民主、崇高、道德等启蒙词汇在“先锋派”、“新写实”、“后现代”的叙事中变得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纯粹的欲望表达、语词迷恋，以及对幻觉、暴力、性爱、逃亡等反常状态的热衷。现代性价值谱系内在指向的“终极性”、“超越性”被无情消解，剩下的仅是“后个人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0页。

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主义”的立场和感觉。这个时代可以宣称“不谈爱情”（池莉），可以直陈“过把瘾就死”（王朔），男人玩的游戏是“请女人猜谜”（孙甘露），女人娇嗔的怨语是“你不来与我同居”。人们对“当下性”的过分迷恋，不仅表明启蒙价值的悬置，而且暗示着文学话语的讲述者不再把自己当成还原历史、启蒙人心的精神主体。

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非启蒙就是启蒙~~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非启蒙就是启蒙~~就是说“要敢于认识”。在提出“敢于认识”口号之后，康德也认识到偏见对人的愚昧和戕害，因此，接下来他说：“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①这里，我们看到，康德将启蒙与偏见、认识与批判联系在一起，指出了启蒙的反思、批判一路。启蒙的反思、批判一路在福柯那里也得到了承继，在《什么是启蒙》中，福柯说：“我不知道是否在今天必须说，批判的任务仍然包含对启蒙的信念；我继续认为，这个任务需要研究文明的限度，这是一种耐心的工作，

① [法]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它赋予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①

今天，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知识分子边缘化已经成为现实，启蒙将以何种方式存在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命题。不过，从对启蒙要义的归位来看，未来的启蒙仍将循着康德、福柯等人的思想前行，在肯定理性、肯定个体、肯定平等的同时，也将理性的批判、选择的多元化等因素考虑进去。英国思想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②。于此，我们说，启蒙是永恒的，有关启蒙的批判也是永恒的。

与启蒙主题相对应的是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晚清后期，为了疗治封建沉痾，挽大清帝国于即倒，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开明专制论》，明确提出“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主张，在梁氏看来，作为君主立宪前奏的“开明专制”，指的是在开明君主统治下，实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逐步为实行君主立宪打下基础。应该说，梁氏开明专制思想有其合理因素，如重视开民之智，包括启蒙理性之智、参政议政之智、思想解放之智。但是，无论怎样开明，专制终归仍是专制。既然是专制，就意味着统治者手中掌握着最高权力，没有另外一种权力来制约他。开明与否，全仗统治者自身，没有其他机制的保证。换句话说，欲通过开明专制走向民主，就得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个别强权人物身上。在近代中国，这种强权人物只能是封建

① [法] 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北京），页。

②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北京），页。

势力的代表，而他们恰恰又是民主革命的对象，怎么能作为开明专制的动力出现呢？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以及封建军阀的别有用心，注定梁氏的开明专制结局只能是与虎谋皮，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梁氏愿年借光绪帝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愿缘年前后拥袁复辟，愿苑年段祺瑞政府的入阁实践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蜂拥而至，尼采、叔本华思想对“五四”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一次“尼采热”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傅斯年、郭沫若……几乎人人都谈尼采，谈“重估一切价值”，甚至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林琴南也在其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中呼唤强力英雄——“伟丈夫”的出现，希望他能用武力镇压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健将。面对积重难返的封建文化，陈独秀、李大钊从人的主体意志出发，强调斗争，重视伟力。陈独秀用生物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来佐证“人力胜天命”，以至得出结论：“抵抗力者，万物各执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谓也。”^①李大钊不但认为整个生物进化史是生命系列为了达到“全生之志”而不断与环境作斗争的历史，而且认为牛顿力学的宇宙“阖辟”两种力量、叔本华哲学的“意志”、斯宾塞学说的“抵抗”是“言不必相谋，理实有相通，森罗万象，各具意志”^②。虽然在历史与意志的关系问题上，陈、李均不同意英雄史观，认为历史取决于“众意总集”，而非个体意志，但在用“人的意志”解释历史进化方面，他们与梁启超的英雄史观并无

①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北京），愿苑年，第愿页。

②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愿苑年，第愿页。

二致。在一个反封建、反传统的革命时代，或曰叛逆时代，张扬个体的“意志”伟力、呼唤反封建的“斗士”，对于动摇、颠覆僵化的封建专制机制，自有其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并且一旦这种呼唤与时人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启蒙要求相遇合，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摇摆不定，批判运动接连不断。工农兵作为新社会的主人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体现者，承担起关于革命的全部想像，文学人物系列中的工农兵形象都是清一色的先进分子、革命英雄，而他们的对立面要么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要么是有着“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正面与反面、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结合与被结合的对立叙事模式在为意识形态提供足够话语支持的同时，也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继续革命铺平了思想道路。“文艺黑线专政”和“三突出”原则，作为“文化大革命”文学的中心话语，在为“文化革命”牢牢掌握话语阐释权的同时，也将文艺界的专制主义思想引向了极致。前者从组织上为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定性——文艺黑线，后者从文学实践层面对人物塑造进行规范；前者直奔主题，将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作为突破口，后者间接专政，让工农兵英雄一枝独秀。也许是物极必反，当专制主义盛极一时的时候，食指、穆旦们的“地下写作”已经开始摆脱专制主义制约，向“人的自由”与“文的自觉”回归。到了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展开，专制主义渐次式微，文学重新回到了启蒙主义的“人学”主题之下。

二 摇救亡与翻身

救亡主题由来已久，其核心意识是晚清开始的民族国家重

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一直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机，争取独立而不做亡国奴的呼声此起彼伏。强烈的民族意识强化着排外心理，排外心理又强化着救亡诉求，即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响亮的音符。

与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西方近代启蒙不同，“五四”启蒙在倡导个体解放及其自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个体对他人的和社会的责任，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爱己”与“爱人”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作为东方封建大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封建思想对个性的压抑，自觉学习吸收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推崇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从而将“发挥个性，表现自己”作为文学的信条。另一方面，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五四”先驱们又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国家落后、民族积弱造成的时代痛苦，感受到封建制度对“幼者、弱者、下者”等广大民众从精神到肉体的严重摧残，热切地期望富国强兵，人民早日从贫穷和愚昧中觉醒，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下，当他们面临整个社会腐朽黑暗乃至国将不国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逐渐将认知视野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并在反帝反封建这一点上达成了统一。也正因此，“五四”先驱们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双重的历史使命：既要为个性的自由解放竭诚讴歌，又要把推进民族解放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承“五四”余绪，**四二**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四三**年代的抗战文学均把救亡主题置于中心，思想启蒙还未来得及深入展开，便让位给全面动员的社会革命。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提

出，从“左联”的解散到“文协”的成立，救亡意识成为各时期文学的中心话题。抗战初期，大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沙龙、咖啡馆、亭子间和学院，深入到工人、农民和士兵之中，战时特殊的文化环境在使他们由思索转向行动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的身份——由职业化作家、思想家转变为民族文艺战士。战争摧毁了“五四”以来启蒙、救亡、翻身、专制主题并存的文学生态场，割裂了文学与它们的齐一关系，文学不再是一种当然的职业，作家必须正视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和神圣使命。

在严峻的救亡现实面前，文学直接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已经成为爱国作家的共识，有的作家甚至投笔从戎。战争初期，因为政治气候的转变，民族团结的加强，英雄主义、乐观主义调子几乎弥漫了所有作家的创作。诗人冯乃超在《时调》创刊号上的《宣言》中写道，“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让它吸收埋藏在土里未经发掘的营养，让它哑了的嗓音润泽，断了的声音重张，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不仅诗歌在动员、宣传方面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短小轻便的其他文学形式——报告文学、通讯、速写、街头剧、活报剧也都践行着抗战救亡的时代主题。战争后期，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社会心理和时代氛围也为之一变，人们开始从抗战初期的昂扬状态中沉静下来，开始正视战争中显现的人性痼疾和社会沉渣，于是，就有了“暴露与讽刺”之争。

1945年10月，《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发表了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小说很快翻译到日本，林林在《〈华威先生〉到日本》一文中，指责《华威先生》暴露黑暗，被侵略者利用，“符合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而增强了他们的侵略信念。一句话，

我们是‘减自己的威风，展他人的志气’了”^①。华林在《暴露黑暗与指示光明》中，为之辩驳道，“凡是世上文艺家，能暴露黑暗的人，也必有光明的建设。……在他的暴露黑暗中，我们能得到光明”^②。论争后来在救亡的大背景下趋于平息。这种一切服从抗战的导向，从文坛的另外两次争论中也能见出：一是“与抗战无关论”引起的风波；一是“反对作家从政论”导致的批判。其实，梁实秋并没有全然主张文学与抗战无关，他的原话是“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③。结果却引发了激烈的批判，反对者从根本上否认抗战中存在什么人性写作，似乎写作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就是对抗战的破坏。沈从文在 1942 年发表《一般与特殊》，对一些作家投笔从政提出批评。因为在他看来，作家从政之后满足于一般宣传，是创作质量下降的原因。他其实并不反对文学创作作为抗战服务，但实在看不起一些文人满足风云际会，游走于官场与文场之间的附庸风雅行为。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了蓄意“破坏抗战”的激烈批评和严厉指责。

不过，同是救亡视角，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也会有所不同。梁启超系最早的“小说救国论”者，他曾主张“今日之最重要者，制造中国魂是也”^④。鲁迅进一步深化，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要求，既包容关心国家兴亡、民族崛起的社会主题，也契合了文学注重人的命运及其心灵的审美特性。茅盾融合救亡与启蒙，认为“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的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淫无耻、自私卑

① 林林：《〈华威先生〉到日本》，《救亡日报》1942 年 10 月 10 日。

② 华林：《暴露黑暗与指示光明》，《新蜀报》1942 年 10 月 15 日。

③ 梁实秋：《编者的话》，《中央日报》1942 年 10 月 15 日。

④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40 页。

劣。人民大众是目击这种种的，而且又是身受那些荒淫无耻、自私卑劣的蹂躏的。要消灭这些荒淫无耻、自私卑劣，便是‘争取’最后胜利之首先第一的要件。”^① 其实，从根本上说，抗战救亡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一场伟大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也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救亡”非但没有终止“启蒙”，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着启蒙、推动着启蒙。由“人的解放”到以“干预灵魂”为中介实现社会解放，由救亡主导的抗战文学到工农兵主导的解放区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与救亡主题的相互纠结使得“时代书写”始终处于创作的中心，进而也左右了艺术形式、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的基本要求。这种情形直到新时期，才有一定的改观。

翻身主题的核心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就开始从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立场出发，为劳工大众鸣不平，《贫民的哭声》中，陈独秀在描述完贫苦农民可怜的生存状况之后，写道：“这十几万人何以到了这样苦恼的境遇？懒惰，没有能力，并不是他们造成苦恼的唯一原因。有些享福的老爷太太，能力不比他们高，而且比有些贫苦的人还要懒惰十倍。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呢？”“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替人民办了什么事？……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现在的时代，还无人敢说政府官吏没有什么用处。可惜他们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② 指出官吏腐败，民不聊生，要求社

① 茅盾：《论加强批评工作》，《抗战文艺》第 4 卷 员期，员年 苑月。

② 陈独秀：《贫民的哭声》，《每周评论》第 员号，员年 远月。